

李冰与天府之国

◎ 潘殊闲

【摘要】 李冰修建都江堰及其系列灌渠工程,有效发挥了灌溉、运输、防洪以及生产生活等诸多功能,奠定了天府之国的生态基础、产业基础、航运基础与精神信仰基础,其融入蜀地民心的诸多功业、佳话与精神共鸣,使李冰真正成为天府之国的开创者与守护神,令万世景仰。

【关键词】 李冰;天府之国;都江堰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8)10-0016-6

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向被称为“天府之国”。考察相关历史文献可知,以成都平原为主的“天府之国”并非天然形成,也非中国最早的。成都平原的“天府之国”与包括李冰在内的一批古圣先贤有直接关系。没有他们的艰苦付出与智慧贡献,成都平原要成为“天府之国”,可能是非常困难的。本文以李冰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梳理与探析,力求厘清他与成都平原这个“天府之国”的诸多关系。

一、天府与天府之国

天府,就其文字含义来说,天有天帝、皇上、天子、上部等含义,府有府库、官署、府邸、宅邸、

聚结等含义。中医谓人有五脏六腑,六腑也写作六府。就人体而言,“天府”指的是一腧穴,即“腋内动脉手太阴也”^①。“天府”也指官职,据《周礼》郑玄之注,“天府”是“掌祖庙之宝藏者”^②。如果“天府”指区域、地域(即所谓天府之国),大概有四种理解,一是天帝(帝王)所居之府(地区),一是天帝所藏之府库,一是天帝所赐之府(地区),一是天帝所造之府(地区)。四层含义都是褒义、美名,所指无非言此地域(区域)风调雨顺,物阜民丰,文明大化。

历史上,“天府”具体指的是哪里?溯源“天府”之来历,可以看到“天府(之国)”这个名称经历了几次变化。最早出现在秦国,指秦国统治的区

① 史崧音释:《灵枢经》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十二,阮元编纂:《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16页。

【作者简介】 潘殊闲,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教授,四川 成都 610000。

域,尤其是关中平原。关中即秦中,这个地方自古就号称“陆海”“天府”,尤其在秦朝时期修建郑国渠之后,一时富甲天下,被古人誉为“金池汤城,沃野千里,天府之国”^①。《战国策·秦策》记述了纵横家苏秦对秦惠文王说的一段话:“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②《汉书·张良传》有大体相同的记叙,颜师古在注释中这样解释“天府”:“财物所聚谓之府。言关中之地,物产饶多,可备瞻给,故称天府也。”^③秦末汉初,张良在论证定都关中时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④。所以,这时的“天府之国”,主要指的是以关中平原为核心的“沃野千里”,一个富庶之地,巴蜀为其边翼。历史上最早单称四川为“天府”则出自诸葛亮的《隆中对》:“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⑤汉代的益州郡包括今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因为四川盆地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交通闭塞,古称“四塞之国”。在冷兵器时代,它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殊战略地位,因而避免了史上多次战争的破坏,得到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诸葛亮等有眼光的战略家都把四川当作可以立围的根基之地,并誉之为“天府之土”。加之因都江堰水利工程带来的便利,四川盆地成为富庶之地,故晋代常璩在所著《华阳国志》中称:“蜀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

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⑥到西汉以后,由于富饶的巴蜀越来越居显著地位,“天府”一名便逐渐成了蜀中的代名词。

二、李冰奠定了天府之国的生态基础

虽然至诸葛亮时才独称益州为“天府之土”,但不等于到诸葛亮时,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四川盆地才具有了“天府”的资质与实力。

回顾成都平原开拓、发展历程可知,这里的自然生态有一个逐步修整、完善的过程。

史前时期的成都平原是不宜居的,因为平原西北部的岷江自源头至成都平原垂直落差有几千公尺,每当雨季,成都平原则变成一片汪洋。据相关史料记载,古蜀时期的蜀国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时期,人称“古蜀五祖”或古蜀“三王”“二帝”。从现有考古发掘和文献载纪的对比来看,已经比较清晰地显现出古蜀先民从岷江上游河谷逐渐迁徙至成都平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与古蜀先圣的治水有很大关系。首先是大禹,出生于岷江河谷地带的华夏人文始祖大禹,以治水赢取天下。其治水,首先从家门口开始,《尚书·禹贡》表述为“岷山导江,东别为沱”^⑦。此“江”即指长江的源头岷江,在相当长时期岷江被视为长江的正源,这就是所谓的人文地理。蚕丛、柏灌、鱼凫都应有治水、兴水、利水的功绩或史事,只是目前文献所及没有看到明确的记载。《路史·前纪四》有云:“鱼凫治导江。”^⑧“导江”则为鱼凫治所。“导江”在哪里?一般指灌县,今都江堰市境内,历史上曾有导江县之称。排开地名所指,“导

①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载:“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阡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97页。

② 缪文远、缪伟、罗永莲译注:《战国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3页。

③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574页。

④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1632页。

⑤ 陈寿撰:《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678页。

⑥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3页。

⑦ 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⑧ 罗泌撰:《路史》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江”就本义言，实为一项水利工程。按照《尚书·禹贡》的说法，（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大禹是华夏人文始祖，大禹在蜀中从岷山导江开始，开启了九州治水的先河。鱼凫是古蜀三王中的真正统治者，他既然治“导江”，那就与“治水”有必然的关系，因为大禹之后，开明、李冰之前，蜀中的水患治理是安邦固民的大事，与地方治理、国家治理关系紧密，甚至是治国安邦的前提与要务。鱼凫作为古蜀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王者，事实上从治理水患开始，造福百姓，立下功劳，所以，死后百姓立祠纪念，诚为情理之中。

而有明显记载有治水经历的是古蜀五祖的最后二位杜宇与开明。《蜀王本纪》有云：“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①此“玉山”即玉垒山。这段记载说明杜宇时期曾经发生大洪水，但杜宇不能治。最后是靠鳖灵，即开明帝得以让洪水消退，百姓才得以“陆处”。关于开明（即鳖灵，或写作鳖令）治水，有文献可查的主要有三处：一处是“凿玉垒山以除水害”，见于《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一是“凿金堂峡”，见于《本蜀论》；一是“凿巫峡以通江水”，见于《水经注》。这三处治水，应当是一个系列工程。开明“凿玉垒山”的目的是“除水害”：即开掘一条由“宝瓶口”泄出的江水，以减杀岷江的水势来保证下游的安全。这就是被称为“江沱”的“内江”古河道。据专家考证，今之“柏条河”即“江沱”故道的遗迹。成都平原是个封闭的盆地，西面和北面的山区里存在着三个暴雨中心。夏秋时节，洪水从西北山区向平原倾泄。而东南的龙泉山脉，仿佛一道天然堤坝，挡住了洪水的去路。幸好龙泉山最东头有个缺口最低，成为成都平原排泄洪水的尾间。这个“缺口”，就是开明氏所凿的“金堂峡”。望、丛之前的鱼凫时代，蜀人就已经进入成都平原；但是，由于平原上要么一片泽国，要么是水潦浸沃的大片湿地，因此只能长

期停留在渔猎文化的经济形态上，连国都都只能建在山陵上。杜宇时代，蜀人已初步掌握农耕技术。为了发展农业的需要，就必须尽快地将平原上滞留的水潦排干。“凿巫峡”就是为了使江水畅流，以便加速平原排潦的一项治水工程。应当说，开明氏“凿玉垒山”的初衷仅仅是为了“保平安”，但是“凿金堂峡”和“凿巫峡”的目的，就已经是在“谋发展”了。

但是，成都平原生态的彻底修整，还得力于另外的一位“伟人”，他就是李冰。

公元前316年秋，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等率大军从石牛道南下伐蜀，蜀王仓促应战，为秦军大败。冬十月，秦军扫荡了蜀的反秦势力，一举兼并蜀国，蜀国从此灭亡。

秦灭蜀国之后，蜀地一度处于混乱状态。为强化蜀地经济保障，在秦灭蜀国之后的40年，即公元前277年（学界对此有不同说法，此不赘述），李冰作为第三任蜀郡守来到四川，开始了他治蜀与兴蜀的历程。李冰治蜀事迹众多，但最有名的无疑是创建都江堰、疏通成都“二江”等重大水利工程，极大地奠定了成都作为巴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②。《汉书·沟洫志》沿用此说。后来的《华阳国志》则这样表述：“冰乃壅江作栅。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③类似的记载在古代众多文献中都有，只是彼此有些差异，甚至有较大的差异。但综合包括上述文献记载可知看到，李冰是在古蜀先贤的基础上，彻底改变了成都平原的生态系统。具体而言，李冰做了这几件意义重大的工程：在开明基础上，整治宝瓶口；修造鱼嘴分水堤，分流江水；修建飞沙堰，排洪泄沙；在都江堰市分江沱水为检江，从成都城西

① 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6页。

②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十九，第1196页。

③ 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第133页。

南流过,称为南河;又分检江东流,从成都城东北流过,二水在合江亭处合流,故云“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开凿石犀溪;开凿羊摩江;凿通管道文井江,与蒙溪分水白木江会合,至武阳天社山下合于江;凿平南安(今乐山)溷崖,疏通大渡河与岷江之阻塞;凿平夔道涯滩;这些工程,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成都平原的生态环境,彻底解决了危害四川盆地的水患,建立起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让水资源成为滋养成都平原的宝贵财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可以说是成都平原变成天府之国的最典型标志。这里所引之《记》,据任乃强先生考证,乃是谯周《蜀记》。“陆海”,也是《蜀记》之语,“谓农田生产之饶,比于海产珍奇之值也”^①。

三、李冰奠定了天府之国的产业基础

李冰修建都江堰及其系列灌渠、灌溉工程,让成都平原及其周边“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不知饥馑”,说明第一产业农业得到了充分保障,其原因就在于,在内外两江干渠和支流“大小水口都安置了斗门,用以蓄水和调节流量,使‘水旱从人’,在这一地区开始初步地科学地治服了洪水……石人和斗门,正是李冰治水时期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②这种创造发明,带来的是农业产业的飞速发展。《史记·河渠书》称“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③,《史记·河渠书》张守节引《风俗通》则言“李冰为蜀守,开成都县两江,溉田万顷”^④。《华阳国志》则这样表述:“又溉灌三郡,开稻田。”^⑤又称:“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穡。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⑥此“三郡”指蜀郡、广汉郡、犍为郡的诸县。“溉田万顷”“溉灌三郡”“溉灌稻田”反复称道的就是这种水利建设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实惠,而“膏润稼穡”则是这种实惠的

形象描述。正因为天府之国成为秦国“粮仓”,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李冰治蜀之前,蜀地并无盐业。蜀地盐业仰给于巴。但李冰改变了这种局面,《华阳国志》这样描述道:“(李冰)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⑦任乃强先生对此解释道:“四川盆地,数百万年前为大海,地下蕴有盐岩,地表中亦多有含氯化钠(食盐),不过因地表被雨水洗涤,溶流以去。其地层之微凹部分,亦皆积有盐水。至于透过深层岩盐后涌出之水泉,则为盐泉,大都涌现于巴国地区,地层褶曲度大,罅裂复杂地方,巴国援之为利而致强大。蜀国地区无此盐泉。李冰前,蜀人食盐仰给于巴。秦灭巴时,巴东盐泉为楚所据,张若等争之,久乃克有。当尚未得巴东盐泉时,李冰创为盐井之法,图盐自给。其最先开创之盐井在广都,故曰:‘穿广都盐井。’”^⑧秦时广都县境,包括今双流与仁寿大部分地区。杜甫来到成都南郊,曾为我们留下一幅产、城一体与山、城一脉的壮观风景:“远烟盐井上,斜景雪峰西。”(《出郭》)

农业的发达,工业的兴旺,加上水运交通的便捷(详后)带来的商贸业的繁盛,蜀地一、二、三产业的联动发展,已呈蓬勃之势,滚滚向前。如果说,古蜀时期的蜀地已有灿烂的文明,那么,李冰修建都江堰之后,成都数千年来长期位居西南乃至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交通运输的中心,其跨越发展的关口正在于此。难怪有学者这样感叹:“都江堰带动了农业而创造出财富,也累积起工商业创造出的财富……‘西僻之国’的罪人迁所,一下子跃居为‘天府’的乐土。”^⑨显然,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四、李冰奠定了天府之国的航运基础

李冰修建都江堰及其系列灌渠工程,综合发

① 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第136页。

② 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文物》1974年第7期。

③④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十九),第1196页,第1197页。

⑤⑥ 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第133页,第133-134页。

⑦⑧ 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43页,第141页。

⑨ 冯广宏:《李冰创建都江堰的历史启示》,《文史杂志》2000年第4期。

挥了防洪、灌溉的作用，还因为疏通、开通了不少河渠、支流，让成都平原沟渠纵横，宛若江南水乡。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水路是最便捷、最经济，也是运量最大的交通运输方式。盆地西部崇山峻岭，有不少参天大木，这是最好的建筑与造船等材料。如果让人工走陆路运输，那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但水路却相当省事。对此，相关文献都有不少评述，如《史记·河渠书》载“此渠皆可行舟”^①。《华阳国志》则表述为“冰乃壅江作棚，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样、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②。“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非常生动形象地将这种水路航运的便捷与便利刻画出来。事实上，正因为李冰疏通郫江与检江，让二江穿过蜀郡成都，使成都与岷江连通，而岷江又与长江勾连，所以，成都通江达海的交通局面由此打开。由此来看，岷江上游的竹木，不需花费任何运费，就顺水漂至成都及其以下地区，为房屋建筑与大型船舶的建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三国晚期，西晋太守王浚为消灭东吴，还曾在成都建造大型巨舰，劈下的断木和刨花，顺江漂进长江下游的吴国，铺满了江面，守军为之大吃一惊。蜀郡南边的“万里桥”非常有名，三国时诸葛孔明送费祎使吴，走到这里，有云万里之行始于此。后因以名桥。杜甫笔下的“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四首》之三）并非想象夸张之词，而是实写。加上成都的一、二产业基础，万商云集，又使成都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成都在唐时赢得“杨一益二”的美誉，这是有扎实的历史基础与现实条件的。

在疏通航运的基础上，李冰在郡城成都市内还先后建造七座桥梁。《华阳国志》有载：“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冲冶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其下，石犀所潜渊中也。大城南门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曰笮桥。桥又从冲里桥西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③此处实为八桥，据任乃强先生

考证，笮桥是常璩夹叙在七星桥之间。其他七桥“皆木制之板桥，可行车马”；而这七桥，“市、江两桥跨郫江，万、夷两桥跨检江，亦略成四方形，似斗勺。冲里以西北三桥，皆跨郫江上游，配合恰似斗柄状。……此应字，只能是相类似之义。……李冰所造七桥，形位与斗宿七星相似，惟不能旋转如斗，每日仅瞬刻与之相应。李冰当时随地理形便造桥，恰有形似北斗之排列。后人遂饰为‘上应七星’，传播于蜀人之口，常璩从而采入于书耳。笮桥位置与七星排列不相应，而与万、夷两桥同在检江上，故夹述及之”^④。

不管当初李冰造桥是否有“上应七星”之初心，桥之于河流，无疑是一种配套，于民众，无疑是一种便捷。在通江达海的河道之上，有七星之桥横跨两岸，对于市民和商旅之客会是一种极大的方便，这些桥梁，应当是推动航运的辅助设施，为成都万商云集的都会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功莫大焉。

五、李冰奠定了天府之国的精神信仰基础

《华阳国志》载：“冰凿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迄今蒙福。”^⑤而《水经注》引《风俗通》则是如此记载：“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江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冰以其女与神为婚，径至神祠劝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厉声以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牛斗于江岸旁，有间，冰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大亟，当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气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也。’”^⑥《史记·河渠书》张守节《正义》也引《风俗通》这段话，只是略有差异，不妨罗列下来，可相互比看：“《风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神须取女二人以为妇，冰自以女与神为婚，径至祠劝神酒，酒杯澹澹，因厉声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于江岸，有间，辄还，流江谓官属曰：‘吾斗疲极，不当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⑦《风俗通》的这两处引文，有

①⑦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十九），第1196页，第1197页。

②③④⑤ 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第133页，第152页，第226页，第133页。

⑥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34页。

意思的是“冰以其女与神为婚”与“冰自以女与神为婚”。前者自然理解为李冰将其女儿许婚给江神，后者除这层意思外，还有一层是李冰装扮成女与江神婚。两层意思都很特别。显然，这是李冰尊崇蜀地习俗，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化煞镇邪。稍后的《太平广记》引唐求所撰《成都记》又有新的载纪：“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吼呼而入。须臾雷风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至今大浪冲涛，欲及公之祠，皆弥弥而去。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未必不由此也。”^①如此演绎，细节更加丰满。应该看到，这是李冰留给蜀人的精神形象，一直激励着、护佑着蜀人。

李冰不仅如此投入与拼命，还“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②。“与江神要”四字，尤其值得玩味。“要”，即“要约”，“约定”，谁能与江神“约定”？当然不是一般人的。而李冰是具有通灵至神的神人，他就具有这样的“神功”。有意思的是，1974年春修都江堰外江节制闸时，从鱼嘴外江一侧江底挖出两个石人，其中一人为李冰像，胸前刻“故蜀郡李府君讳冰位”，两袖上刻“建宁元年闰月朔廿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③。建宁元年闰三月为公元168年，距李冰为蜀守、筑都江堰400余年。李冰不仅生前勇斗水神，造福百姓，死后还化作石人，立作“水则”，形象地警示后人不同水位线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古代设置石人和石犀，分别用于测量水位，疏浚渠道，进行科学管理”^④。而“珍水万世焉”这句箴言，则是留给蜀人永远的

精神财富，它深刻地告知蜀人，水是蜀人生产、生活的命脉；善待水、合理地利用水与治理水，与水友好相处是蜀人万世珍藏的法宝。

事实上，李冰莅蜀，非常尊重蜀地民间信仰与习俗。蜀地本有大石崇拜的习俗，蜀地的稻作农业，水牛（被蜀人称为犀）是犁田耕地的好帮手。《华阳国志》这样描述：“（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耕牛（一作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⑤这种做法，奠定了蜀中民众的信仰基础，坚定了蜀中民众的精神力量，千百年来，成为护佑蜀中百姓的守护神，后世这类信仰与传说不断增益，蔚为大观。

毋庸讳言，李冰对蜀地神灵信仰非常重视，先后在蜀地建有湊山祠，祭岷山山神；江湊祠（庙），祭岷江水神；望帝祠，祭古蜀先王。李冰祭三祠，用的是中原祭礼的最高级别，其目的就是向蜀人展示，他尊崇蜀地习俗，秦、蜀不仅政治相通，且精神与心灵也相通，“把它放在秦在西蜀的统治大业中看，把它放在建堰大业中看，就会发现它具有协调科学与土著宗教的关系，借神力统治蜀人，借神力号召、组织土著蜀人共同建堰的整合功能。”^⑥这些做法，无疑统摄了蜀人的心灵世界，赢得了蜀人的精神共鸣。加上李冰在蜀地留下的众多功业与佳话，后世李冰不断被神话、仙化、宗教化，也就是顺理成章、不足为怪的事了。

综上，李冰修建都江堰及其系列灌渠工程，有效发挥了灌溉、运输、防洪以及生产生活等诸多功能，其融入蜀地民心的诸多功业、佳话与精神共鸣，使李冰真正成为天府之国的开创者与守护神，令万世景仰。

（责任编辑 王 林）

①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316页。

②⑤ 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第133页，第133页。

③ 转引自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三注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4页。

④ 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文物》1974年第7期。

⑥ 贾大全，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卷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页。